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
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
影响研究导论(下)

张西平 著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
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



张西平 总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

张西平 总主编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 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 影响研究导论(下)

张西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第二编

理论编

在“历史编”我们初步勾勒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历史,这一编我们将对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传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如果从理论上讲,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传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值得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本编只对四个问题展开研究,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二是明确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三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四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经典外播研究。这四个问题是关涉理解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四章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

导 语

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西传史的研究,它同样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意义重新认识的思想过程。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视域,我们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反思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晚清以后的百年,中国以西为师,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是以批判为主要导向,无论是向美英学习,还是向苏俄学习,大体都是如此。我们很少考虑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价值和意义,很少考虑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贡献,很少知道中国文化经典西译后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与贡献。近30多年的发展,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中心,在我们继续拥抱世界,接纳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告别以西为师的时代开始了。文化自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外传的学者不可能对自己的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如果这样做学问,这种学问就是伪学问。任何学问都有价值立场,如果没有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所包含的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的研究就仅仅是一堆没有灵魂的知识。我们必须回到中国文化价值这个核心的问题上来。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外播

1. 重建世界文化格局

我们在“历史编”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中国文化经典的西译从晚明时期已经开始,那时翻译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①。晚清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的炮舰打断了中国社会缓慢的自然成长,中国被纳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体系之中。从此,“以西为师”成为中国文化百年的主调,百年欧风美雨,西方文化迅速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语言、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宏大的历史叙事来看,尽管这是无奈的选择,但这促成了中国文化新的再生和发展,虽然是被动的。

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化,因此翻译西学经典成为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职责。虽然在民国时期有《天下》杂志横空出世,于危难中传播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外文局力挽狂澜,在西方文化的围剿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辩护。但从总体上看,中译外在中国百年的文化格局中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中国的国家实力仍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国家仍处在积弱积贫之中,我们不可能考虑中国文化的输出问题,那时解决的是如何渡过国家和文化的危机问题。但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心,文化的输出,中国文化经典的外译就自然成为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与西方文化的相处中,我们应承认这样的现实,今天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他们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格局,开创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因为西方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在文化问题上不能完全由西方主导。由此,中国文化经典的外译及其研究就成为一个重建世界文化格局的重要的问题。

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外播的文化意义,首先就要有文化的自觉。这是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起点。

^① 关于中译外的翻译主体问题,我们在下一章专门研究,这里不再展开。

2.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 1997 年的一个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①

费老这里讲的文化自觉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回应。这是说费老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全球化浪潮,打破了地域文化的界限,各种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遇,西方文化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向全球扩张。此时“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相互角逐”^②。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全球化是那些大资本的公司推动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推动的,因此“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③。在西方强势的文化面前,与其相遇的文化自然会有反抗、抵御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从改革开放到费老提出文化自觉,中国的知识界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从最初的拥抱全球化到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的西方化,看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做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我们会看到‘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特殊的价值论述。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过程,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

③ 爱德华·W. 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页。

们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连续性的问题,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达形式”^①。

张旭东的这段话应该是对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原因的最好解释,说明费老提出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讨论,它是对全球化在中国展开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问题的一个回答。

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给我们提出:在当今世界上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何在,意义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文化持续到今天价值何在?费老在今天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告别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们的历史文化凝结成的文化传统生活有没有价值?如何处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现代化文化,这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文化认同当然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但如果从长时段、大历史来看,这个问题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一直是存在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面对这种外来文化,儒家士大夫们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吸收的过程,在佛和儒之间当时就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韩愈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写下了《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谏迎佛骨表》等一系列的文章,后因他上书反对迎佛骨,激怒了皇帝而被贬。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历史的发展和韩愈的主张相反,佛教文化终于融入到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到晚明时,儒、释、道三教合一已经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证明: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有两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次,一次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次是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在“历史编”中我们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对文化的发展的展望。费老和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 1884—1942)一样对西方殖民主义充满了反感,因为,西方文化在其扩张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多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摧毁了,把异于西方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同质化了,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日益失去文化的多样性。谈到他的老师的这个观点时,费老说:“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①

3. 文化自觉的学术意义

费老提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文化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这个原则就是在自身文化认同条件下的多元文化观。显然,这是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基本出发点。如果说自晚清起中国文化自然发展历程被打断后,西方文化以强势进入,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虽然充满苦难与艰辛,但中华文化并未中断,变迁的中华文化在断裂中保持着连续性。

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当代文化的合法性的认同,这是一个学术的基本立场。如果没有这个学术的基本文化立场,开展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意义就全部失去,从而使这个研究变成一堆死去的知识,研究者的文化立场完全没有了。每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研究的研究者都应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①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②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二、重新认识确立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

1. 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播是关键

“历史编”的研究已经提到,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以它独有的魅力感动过许多西方的哲人,中国思想和文化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19世纪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中国日益被妖魔化,在文化的较量中,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所承载的思想和价值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中国文化开始被分裂,一个是躺在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是充满矛盾的中国当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被列为国策。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传播的规律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输出。只有在人类历史上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上,阐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才会让别人接受,东海、西海乃一海,天下同心、同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理想。阐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价值,揭示其在中国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义,就成为我们开展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的基本文化立场,也是我们今天常讲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一个没有文化价值的文化是永远不会打动人的,一个没有文化意义的文化是永远不会传播开来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它更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是一种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传播。所以,从学理上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意义,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化400年来在西方传播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一种文化能否被传播、被接受、被理解,核心是它的价值是否具有意义。

2. 中国古代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谓的“文明古国”指的是创造出人类最早文化形态的国家。一般来讲“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和古印度。本书所确定的主题是代表古代文明中中国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意为地处中原的华

夏民族。中华的“中”，意为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为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章太炎先生曾说过：“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①

中国文化产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因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相比其他文化，它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在基本未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下，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只是在此之后，它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外来文化对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基本确立了。

第二，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化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进而中断自己发展的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不仅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古巴比伦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态已经被深深地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断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文化的高度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一样，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国为文化母体，大规模地吸纳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符合他们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 19 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文化圈。由此，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国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藏在巴黎的一个敦煌卷子中的内容来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期，1907 年 7 月。

表达,这是一位来中国礼偈的梵僧的一首诗:

礼五台山偈一百一十二字

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

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

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取则慕华钦。

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经远自临。

故来发意远寻求,谁为明君不暂留。

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

何期此地却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

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这种将基督教历史观作为人类历史观的“历史轴心”说,显然是站在欧洲基督教的立场上来讲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它并不能概括整个人类的历史。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历史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他将人类文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工具的产生和火的使用的时代;第二阶段为公元前5000年到前1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第四阶段为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他说,要是历史有一个轴心的话,我们必须依靠经验在世俗历史中来寻找,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所有人都重要的情况,包括基督教徒在内。它必须给西方人、亚洲人以及一切人都带来信念……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Upanishad)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

袄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先知们奋起;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希腊产生了诗人荷马(Homer),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柏拉图(Plato),还有悲剧诗人以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①

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角度对世界文化发展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②。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存活下来的人类远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的文化,同时也高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③。

3. 中华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在这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

(1) 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理念

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特征时首先就指出“国家”与“民族”的融合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出发点。他说:“我们要讲述中国文化史,首先应该注意两事。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

①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②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十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③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①

作为地名的“中国”二字，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何尊”。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其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后来，中国这一概念也被作为文明和文化的意义使用，而不仅是地理的概念，《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公子成的话最为明确，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由此，‘中国’‘中华’与‘夷狄’之别，也渐由地理区域之别，渐变成为文化与文明之别。”^②

从民族来说，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中华民族从上古到秦汉，从以华夏族为主干的中原文化至满人入关到现代，不断地吸收、融合和扩大与更新，从而形成民族生命之河。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各民族文化在趋同汉文化的同时，仍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犹如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样。“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③

从国家来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秦始皇修长城，原本是为了防御草原民族的入侵，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却是：长城内外是故乡。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建立不仅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的历史，反而使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新的血液，使中华帝国的版图在一定的地理单元中形成更为统一的国家。“正因为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

所以，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页。

② 王学典：《答基辛格问》，《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3日。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页。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也和中国各派思想家的倡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墨家求“尚同”，儒家求“大同”，汉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人三策》，载《汉书·董仲舒传》）